

论汤显祖及其他

徐朔方著



论汤显祖及其他

徐朔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论汤显祖及其他

徐朔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72,000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1,400

统一书号: 10186·400 定价(七): 1.40 元

自序

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虽曾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但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探索还是有进展的，特别是小说戏曲方面的进展更大。这也许令人感到意外，但却无可置疑。如果有一部三十多年前的中国文学史要在现在重版，必须作出较大修改的首先是小说和戏曲部分。这不是本书作者的偏见，或对同好者的虚言慰安。

人们有理由责备古代文学书籍的出版太少太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和研究者的需要。同时并存的是另一事实：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古籍的出版和发行成就巨大，尤以小说戏曲为最。故文化部长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和《红楼梦》各种稀见抄本以接近普及的形式影印，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例子。

本集所收论文以上述情况为背景陆续写成，论述对象以小说和戏曲为限。

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的历史。它的特点之一是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本书以《宝剑记》论定《金瓶梅》的成书上限不早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推论它的写定者不是王世贞，而是李开先。写定者问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的成书上限却很难再提早或加以否定。本书又以元代杂剧对《水浒》和杨家将小说成书过程中的某些事实作出适当的

解释。上面说的是以戏曲证小说。以小说证戏曲，探讨小说影响及于戏曲，论文《汤显祖和金瓶梅》是一个例子。

中国小说戏曲史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相当多的作品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文人的编写有时在重新回到民间、更为丰富提高之后，才最终写成。本书把这一类作品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继中国戏曲史开创者王国维之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早期学者在六、七十年前就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西厢记》等个别作品的研究中提出这样的论点。今天已经成为文学史常识了。然而在具体研究中似乎影响甚微。这是说，许多研究者一面承认这些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另一面在实际上却又无形中把它们作为个人创作看待。

试以《水浒传》为例。如果不是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承认它是历经南宋、元、明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那就不会说它是反映北宋宋江起义的小说，不会说施耐庵、罗贯中是天才作家，不会置信施耐庵必先参加农民起义或者至少得和农民起义有瓜葛才写得这样一部小说。《水浒传》影响之大，以至某些严肃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也误以为宋江起义声势不凡，把它和陈胜、吴广、黄巾、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杨秀清起义相提并论。其实根据历史记载，宋江起义规模有限，还不及同时代的方腊起义。象《水浒传》所描写，攻城略地，兵锋所向，北至大名（今属河北省），南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西达华州（今陕西省华阴县）的起义在宋代根本不曾出现过。这些话不是对《水浒传》的指责，而是对把《水浒传》看作北宋宋江起义的真实反映论的异议。只有心口如一地承认《水浒传》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才能对小说的许多不合理描写和叙述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它的编著写定者，无论是施耐庵、罗贯中或别的书会才人的劳

绩，才能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承认《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个别的具体作品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一回事，进而揭示这类创作是中国小说戏曲史上体现某种规律性的重要现象则是另一回事。本书基于作品的内证，第一次把《金瓶梅》、《琵琶记》置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行列中。只有立足于更多的事实依据之上，这种现象才可能受到充分的重视。从来都认为《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同一作品各部分优劣不齐是常见现象。但象《金瓶梅》那样，它的第五十二回竟会抄袭前面第十九回的大段描写却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不提更多的例证，单从这一孤立的事实也足以使人怀疑它是个人创作，抑只是若干现成本子的编集或写定，愈到后来而愈见草率。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正确解决，小说史的真实轮廓至少局部地掩映在朦胧的雾霭之中。

诚然，《琵琶记》一向被认为是民间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改编，高明一举把它由原始质朴提高为传奇的开山杰作。彭飞、朱建明同志的论文却指出高明之前已经存在着和今本相同的曲文十支。他们的疏失是误以为高明和《琵琶记》无关。本书在彭、朱论文的合理部分的基础上确认高明是它的编著写定者。这是戏曲史上由民间而文人，由文人而民间，几经反复，最后才由文人写定的一个生动事例。

戏曲史上已被论证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事例不如小说史上那么众多而显著，似乎只有《西厢记》、《琵琶记》，此外还可以加上《长生殿》。从高明之前已经存在着的和今本相同的十来支曲文看，高明至少在这一小部分着墨甚少，几乎无所润色。也许在曲文比较典雅的部分会有所不同。《西厢记》和《长生殿》尽管因袭前人之处不一而足，却已经有机地加以改造，从而具有鲜明的个人创作风格，以至于不宜将它们列入世代累积型集体创

作之列，但在作品内在深处，却仍然带有这种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戏曲在这一方面和小说不同，可能由于它篇幅不及长篇小说那样巨大，容易将不同来源的组成部分融为一体。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曾在一九六四年杭州大学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人在会外放风说，这篇文章和西方比较文学有什么不同？说话人手中并无权杖，我却无意招人侧目。一搁二十四年，才在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和读者见面。想不到此后比较文学竟会成为一时风尚。比较文学在许多西方大学文学专业中列为必修课。这个集子里也许有一二篇论文可以归入此类。与其说是有意宣扬，不如说只是从朴素的意念出发、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不管古今中外，只要彼此挨得上边，就任意加以比附。与其趋时竞新，我倒宁愿保守。

一九五六年《汤显祖年谱》脱稿时，我曾在此书卷首预告将有《汤显祖评传》和《年谱》配合。迄今未能兑现，深为歉仄。其实，《评传》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完稿，但为自己所不满。后来先后写了本集所收的有关汤显祖研究的几篇专题论文，现在才回头重写《评传》。时时为别的工作所中断，进展缓慢。希望在一、二年内完成。

本集所收论文，始于一九五四年，迄于现在。凡二十八篇。除古籍整理和校注四种、年谱一种和未定稿四种外，课余之暇，三十年来东涂西抹，差不多都在这里了。“多乎哉？不多也。”想起孔乙己信口搬弄的孔圣人的这句话，正好为自己碌碌无成解嘲。是为序。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于西湖宝石山之阴

目 次

自 序	1
✓ 汤显祖和他的创作	1
✓ 汤显祖的思想发展和他的《四梦》	14
关于《南柯记》第二十四出《风谣》及其他	28
✓ 论《牡丹亭》	34
✓ 《牡丹亭》的因袭和创新	55
再论汤显祖戏曲的腔调问题	63
关于汤氏家藏《玉茗堂集》板片	70
✓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73
汤显祖和利玛窦	91
附：英译本《利玛窦纪行》英汉名词对照补正	104
汤显祖和沈璟	106
关于汤显祖沈璟关系的一些事实	121
汤显祖和《金瓶梅》	125
《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	133
《金瓶梅》成书补证	148
论《金瓶梅》	159
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	179
《施耐庵生平探考》质疑	201
论《三言》中的明代作品	203

《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考辨	230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由来	238
《琵琶记》的作者问题	243
元明两代的杨家将戏曲和小说	251
臧懋循和他的《元曲选》	266
沈璟和他的创作	301
论《长生殿》	310
《长生殿》的作者怎样向在他以前的几种戏曲学习	332
《红楼梦》爱情题材的评价	337
论贾宝玉	355

汤显祖和他的创作

汤显祖以《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和关汉卿、王实甫后先相辉映。在明代三百年中,没有别的任何一位戏曲作家像他那样受到后人的敬仰。但是在当年他却主要以词赋和古文倾动海内。他被列入当代举业八大家之一。他既是八股文的能手,又是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劲敌。而《明史》之所以为他立传,却因为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汤显祖的为人和成就包含着不同的以至似乎是矛盾的几个方面,它们既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是他的个性和品格的极其独特的表现。

汤显祖(一五五〇——一六一六年)字义仍,号若士。出身于江西临川的一户书香人家。他的上辈虽然几代不曾做官,在当地还是享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他十四岁进学,二十一岁中举。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走上仕途。他在南京历任太常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1591),他因上书抨击朝政受处分,被贬官到广东徐闻,挂一个典史的空衔。两年后,量移浙江遂昌知县。在这个偏僻的山城做了五年县官。万历二十六年春天他弃官回家。三年后,吏部考察官员给他一个“浮躁”的罪名,正式被免职。弃官后他家居玉茗堂,直到老死。

在汤显祖的时代,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有了进一

步发展。明朝最为专权的两个首相严嵩和张居正都是他的同时代人。尽管汤显祖早负文名，万历五年、八年两次春试，他都没有考取。原因就是他一再拒绝张居正的结纳。一个正直的人出仕是为了施展抱负，报效国家，自然不屑走上趋炎附势的升官捷径。张居正死后，他考取进士，但又拒绝了执政申时行、张四维的结纳，宁愿失去考取庶吉士的机会，而到南京去做一名太常博士。接着他又辞谢了别人的荐举，不到通常视为美缺的北京吏部去供职。汤显祖的守正不阿的性格，事实上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一种抗议。

明朝以南京为留都，在这里也设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机构。其中有一部分官员是受到冷遇、排挤，才安插到南京来的。虚有六部之名，很少有实际政务让他们去处理。因此，南京及其附近的江南地区就逐渐形成一种舆论的力量。在某些问题上，他们竟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后来才正式形成的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是这个反对派的中心。汤显祖在南京议论风发，很早就显出他的疾恶如仇的不妥协精神。早期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和同情者如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顾允成等都是汤显祖的好友。从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批评朝政时有着共同的立场。汤显祖贬官后，顾宪成曾设法让他回到中央政府任职，由于执政一再刁难而没有成功。到了晚年，汤显祖和东林党在个别问题上看法有分歧，但是他们的友谊始终如一。

东林党是一个松弛的政治集团，同时又是理学的一个流派。政治和理学的结合，使得他们过分注意于狭窄的道义之争，有一些争论和人民的利益并无多大关系。如果说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从理学出发，汤显祖则更多地从当时的现实着眼。万历十五、六年江南大饥荒，汤显祖不仅是目击者，作为一个低级官员，他自己也感到生活艰难。这样他才可能写出如下的诗

句：“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疫》），显示出他对阶级社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正是从这样的现实出发，他才会《论辅臣科臣疏》中毫不留情地抨击杨文举；一个救灾的使臣给灾区带来那么多的灾难之后，居然受到特别的提升。也正是从这样的社会现实出发，他才给万历朝的统治作了一个清算：

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

清醒地面对现实，不从玄虚的理念出发，正是在这一点上，汤显祖的某些政治主张比顾宪成、邹元标等人更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论哲学思想，汤显祖是罗汝芳的及门弟子。而罗汝芳则是泰州学派创立者王艮的三传弟子。汤显祖曾经这样回忆老师对他的教育与影响：

盖予童子时，从明德（罗汝芳）夫子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泠如也。后乃畔去，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

《太平山房集选序》

尽管汤显祖不吝惜对老师的赞扬，很明显，罗汝芳的这一套性命之学对创作是有害的。别的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好一些。罗大紘写信批评汤显祖“过耽绮语”^①；邹元标则劝他不要“跳叫际晓，登高赋诗，自写其抑郁无聊之气”^②。这是理学家对汤显祖的消极影响的一个方面。但是有一些理学家毕竟也受到统治者的迫害，而他们的抗争却是意气昂扬，和他们平时所向往的“天机泠如”的境界很不一样。当颜钧监禁在南京，罗汝芳不惜卖田鬻产，在狱中随侍六年，终于把老师营救出来；而他自己也因为坚持讲学，受到勒令致仕的处分。这种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对青年汤显祖是有教育作用的。这是理学家的身体力行对汤显祖

的积极影响的一个方面。

佛家和道家思想对汤显祖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宋明理学原来就是儒家掺和佛学的产物。像罗汝芳那样的理学家居然也谈“烧炼采取飞升”^③之术，可见道教势力也很盛。嘉靖皇帝朱厚熜荒唐地自封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汤显祖的同年进士朱长春则为白日飞升，几乎跌死。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上流社会耽溺于道教到了何等地步。这一点对我们了解汤显祖《邯郸记》传奇的写作有好处。汤显祖对佛学所下的功夫远比道教深。他三十岁时就在南京清凉寺登坛说法了。也许没有另一个人像达观禅师那样给汤显祖以这样大的影响。他们的遇合带有浪漫色彩。有一次，青年汤显祖的发簪偶然落入南昌西山云峰寺的莲池中，随即写了一首诗题在壁上。后来被达观看见了，认定诗人有出世思想，立意要度他出家。整整二十年后，他们才在南京见面。从此两人的关系就很密切。汤显祖贬官徐闻，达观打算到广东去看他。达观登山涉水访问了遂昌，汤显祖罢官的那一年又来到临川。临别，汤显祖一直远送到南昌。我们知道这之后第二、三年，汤显祖的《南柯记》、《邯郸记》先后完成，这不能是偶然的巧合。达观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佛学大师之一。他对正统的朱熹哲学所作的批判，虽然从右的方面出发，但是同样为封建统治者所难以容忍。他声言“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④，则是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态度。据汤显祖自述，他研究了嘉靖、隆庆间的现代史之后，曾和别人讨论了张居正以下几个辅臣的评价，要把讨论的要点写出来由他校定。这时有一个奇僧睡面告诉他，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陈死人了，犯不着编写他们的事迹。这个奇僧很可能就是达观，他的这番话和《邯郸记》对大官僚卢生的批判揭发是精神一致的。

和汤显祖交往不密而思想影响却值得注意的另一位思想家是李贽。汤显祖在书信《答管东溟》中说：

见以可上人(达观)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汤显祖从反封建角度出发，以李贽、达观相提并论，和御史康丕扬从封建立场出发也以两人相提并论，真是不谋而合^⑤。当李贽的《焚书》在麻城一出版，汤显祖就注意到了，并且写信给友人殷勤求访。值得注意的是，在《牡丹亭》里所表现的强烈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除了李贽《藏书》卷二十九的《司马相如传》之外，同时代还没有一位思想家这么明确地提出过。《牡丹亭》完成于《藏书》出版前一年，这是他们两位先驱者各自从文学和哲学的领域所发出的战斗的召唤。

上面所说的是当时的哲学思潮以及它们和汤显祖的关系，事实上这已经接触到汤显祖本人的思想实际。汤显祖是一位古典作家，他不像哲学家那样具有比较严密的思想体系。他没有独尊一说，而是兼收并蓄。有所取舍，取舍中不免也有矛盾。他和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是有共鸣、有交流的，但是也和他们有所不同。其中有一个分歧是，作为一个作家，他首先从生活实际出发，而道学家则把抽象的理念看得比现实本身还更重要。因此，了解汤显祖的社会实践对了解他的思想实际有着重大的意义。像所有古典作家一样，汤显祖也有平庸的一面，他热中科举，视科举为封建文人的唯一出路，为八股文和应酬文字消耗了大量精力，迷信道教，在佛学的经藏中寻求慰藉等等。不同于常人的是几乎在同时他又对科举、八股文、应酬文字表示厌弃，讥笑企求长生不老的服食者。佛教的轮回说也免不了他的嘲讽。他的思想复杂而又矛盾，但是就一个作家思想的最主要之点即他

对人民的态度来说,在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过程之后,终于在创作《牡丹亭》的那一年和统治阶级产生深刻的分歧。

他在五言古诗《三十七》中写道:

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

留名佳丽城,希心游侠窟。

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

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

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

这是缺乏生活实践的青年人的主观愿望。接连几次考试失利,再加上太常博士任上的几年困厄,事实已经向他证明仕宦的道路是崎岖多阻的。他自己也曾一再流露对官场生活的不满,但是当他升为礼部主事时,内心就对朝廷充满了感激之情:

臣心似江水,长绕孝陵云。

《迁祠部拜孝陵》

其实不过是主管祭典的小小一名六品官而已。他在万历十九年写的《论辅臣科臣疏》已经对朝政作了相当深刻的批判,但是他对皇帝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怀着合作的态度企望有所匡救。正因为如此,他依据《紫箫记》未成稿改写的《紫钗记》传奇,虽然愤懑地刻划了权贵的专横不法,而黄衫客却只能依靠他和宫廷的关系才能打抱不平。

岭南贬官回来,虽然有友人刘应秋、顾宪成、王汝训等人在上面多方设法,但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愿望还是不能实现。在遂昌五年,他和劳动人民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他满怀信心,要对当地人民作出贡献。他驱除虎患,压制豪绅,建立了寄宿学校相圃书院和图书馆尊经阁,实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但是一个真正想替人民做点事情的县官,往往遭到上级的挑剔和当

地封建势力的反对。在交相排挤的情况下，加上横行不法的税监就要来到，他在北京上计后就管自己拂袖回家了。就在这一年秋天，他完成了《牡丹亭》的创作。同时写的一首绝句《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

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

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渐高。

正好说明他的思想已经和从前不同。他和统治阶级的裂痕增大了，他的热讽冷嘲的笔触落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本人身上。这在他自己和同时代作家的笔下都是罕见的。自然，《牡丹亭》写的主要不是政治问题，但是作者与统治阶级的深刻分歧却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个性自由的热烈追求都是有利的。

《南柯记》、《邯郸记》相继在五十一、二岁完成。离开《牡丹亭》的写作不过二、三年。可是由于和实际斗争疏远了，原来潜伏着的出世思想容易伺机而动，使得他对现实的批判抗议的态度逐渐为消极情绪所代替。加以临川知县吴用先、袁世振都是他的禅友，达观和乐愚禅师先后来访，西儿和长子士蓬又不幸夭亡，他愈来愈不易摆脱出世思想对他的影响。但是这两种戏曲的基调是不同的。《南柯记》的若干出戏成为宗教概念的表述，佛学术语的大量运用妨害了艺术形象的完整。而《邯郸记》一头一尾的说教则和整个故事较少有联系，好像《红楼梦》的色空观念一样，没有在作品中占有主导地位。在主角卢生身上，人们看到的是封建大官僚从起家发迹直到死亡的历史，作者所否定的并不是人生一般。

《邯郸记》完成以后，汤显祖的才华衰竭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斗争的态度上。如果说在写作《南柯记》的那一年，他劝告达观不要积极干预政治，可能是从爱护同道出发，那末当敢

于和宦官斗争的老友李三才被弹劾，顾宪成从东林书院写信给执政为他辩护，汤显祖却认为顾宪成的道理虽然对，而“细欠商量”^⑥，不够慎重。这里除了态度消极，很少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这是他逝世前五年的事。

汤显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也很丰富，尤以《牡丹亭》为最重要。^⑦像崔莺莺、林黛玉一样，它的女主角杜丽娘是古典文学中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作家以他无比的热情，描画了一位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幸福的少女。作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作为封建体系的一个对立者，杜丽娘在剧中处于无可比拟的地位。相形之下，派去教育她的陈最良和为她驱病的石道姑都是鬼蜮一样的人物。不像《西厢记》、《红楼梦》那样表达封建婚姻制度如何在一对爱人的幸福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加以破坏。《牡丹亭》是完全独特的处理。它以杜丽娘之死指出要找到爱人是不可能的，不要说结合了。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就这一点而论，杜丽娘之死所表示的作家对现实的态度是特别清醒的。

汤显祖在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我们知道超越一切的抽象的情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语言，但是反封建的情是作为封建的理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它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有力批判。剧中杜丽娘的理想在今天已经过时了，但是它所反映的古代人民的斗争经验，还是值得我们重温和借鉴的。

《牡丹亭》之所以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由于富